

21 世纪的城市与建筑的思考

Thoughts on the Urban Architec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毛其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4)

一、国际建筑师协会与世界建筑师大会

国际建筑师协会(简称国际建协)为世界各国建筑师协会或学会组成的国际性组织,1948年6月28日成立于瑞士洛桑,会址设在法国巴黎,现有会员国100个左右。

国际建协的宗旨是联合全世界的建筑师,不论他们国籍、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职业训练和建筑学说如何,建立起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的友谊关系,交换思想观点,吸取经验,扩大知识,取长补短。协会为非政府组织(NGO),其职能是在国际上代表建筑行业,促进建筑和城市规划学科的不断发展,并关注各个领域的建筑教育事业;建立职业范围,支持各国建筑师组织保护建筑师的权利和地位;促进建筑师及有关人员之间的国际交流活动等。

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以来举办过20次世界建筑师大会,前19届大会的主题分别为:面临新挑战的建筑学;建筑如何面对新挑战;建筑在十字路口;建筑与房屋的演变发展;建筑与重建;新技术与新材料;不发达国家的建筑;建筑师的培养;建筑与人类环境;作为社会角色的建筑;建筑与娱乐;创造力与技术;建筑与国家发展;建筑、人、环境;建筑师现在与未来的使命;住宅与城市——建设明日之城市;文化与技术;建筑在十字路口——为可持续的未来设计;现在与未来,城市与建筑。

在现代建筑史上,曾留下两个很有影响的文献,一是国际建协前身“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在1933年讨论通过的《雅典宪章》,二是1978年经国际建协墨西哥大会通过的《马丘比丘宪章》。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的《北京宪章》,则是世纪之交国际建筑界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献。《北京宪章》是我国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主持撰写的。吴良镛教授在6月28日举行的国际建协第21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国建筑学会提出了设立一个国际建协“北京之路”工作组的书面建议。该建议旨在由中国相关单位牵头,由国际建协各区派代表参加,

共同组成一个以研究建筑学各专业领域发展为基础的专业活动工作组,并同德国建筑师合作,把《北京宪章》相关内容综合到2002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建协第21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议程中去。该建议当即获得代表大会的通过。

二、展望 21 世纪城市与建筑学的发展

第20届大会就当代建筑发展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其中虽不乏时代的忧患与沉重,但更多的则是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是对21世纪建筑学的积极思考。

1. 建筑与环境

自全球首脑签署“21世纪议程”,国际建协第18届大会提出“为持久的未来而设计”,以及联合国“人居二”大会以来,人居环境建设已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自然资源环境毁坏的痛苦之后,人类第一次开始对其所居住的星球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本届大会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内容包括:环境观念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建筑学的影响;21世纪的建筑与环境特点和建筑的可持续发展的推进;社会公正与建筑;健康建筑与健康城市;生态建筑与生态城市;创造适合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的建筑环境;传统与现代建筑技术与环境;历史环境及其保护;环境与美学。此外,有关的论文还涉及;全球人类生境的环境生物学方法;建筑理论与实践和环境与政治的联系;多样性与持续性;中介介质的空间设计;生态建筑学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可持续建筑的设计过程和当代的解决方案,以及山地环境空间、可居住的地下空间、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建筑设计、21世纪的生土建筑、历史与绿色相结合的住宅保存方法、发展中国家的建筑环境可持续设计,等等。

在对美好环境的呼吁过程中,人们逐渐得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结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改进和理论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应形成一种社会的共识和积极的行动。

2. 建筑与城市

新的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根据联合国人居中心(UNCHS)的预测,人类进入21世纪时,全球将有1/2的人口生活和工作在城镇地区。到2030年时,城市人口将占世界人口的2/3。

无可否认,城市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中最光辉的一页。然而,城市的贫困化也随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却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它与城市人口过剩、住房不足、环境恶化、青少年犯罪和西方文化入侵等视为同义语。鉴于多数市政当局都缺乏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一种自上而下的舆论曾四处传播:只要能控制住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则城市本身就会表现出乐善好施的主动性,并形成一个人更加富有人性的尺度规模。

在过去的50年,联合国及其各成员国政府为乡村的发展计划提供了大量资源和技术力量。与此同时,各种国际组织也对乡村地区和农业部门不断予以帮助,目的都是企图减缓城市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努力并未获得显著成效。这种“理想主义”的观点不仅抑制了城乡经济的增长,而且导致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衰退。

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想入非非地要越过城市化阶段,走所谓的‘消除城乡差别’、‘城乡结合’的道路,完全脱离了实际。..甚至否定城市,铸成大错”(吴良镛,1996)即使到了90年代,某些权力机构中似乎仍存在着对城市贫困、住房短缺和交通拥挤熟视无睹的现象,并仍企图从法律上将一部分人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城市科学研究的欠缺,从而无法真正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意义及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然而,城市化进程始终在继续。历史证明,所有遏制城市扩展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虽然在1970年时还不到7亿,但到1990年时就已经翻了一番,增长至14亿;预计到2000年将发展到21亿。目前的事实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虽仅占其总人口的1/3,但却已拥有了2/3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在整个国家中位居前列。限制城市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城市化开始被视为一种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积极因素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对那些还未经历过度城市化的国家,是否应鼓励他们继续保持目前的分散状态?另一方面,完全依赖所谓的现代信息技术能否满足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需求?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的艰难曲折之后,建筑师规划师那种把现实简单化的幻想可能会有所收敛,因为建筑不仅仅是一种视觉或空间的设

计。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人类至少已经能够更加全面地考虑城乡建设问题,他们新的目标将是有效改善城市中的生活质量。

3. 建筑与技术

从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建筑师大会都曾将技术作为讨论的主题。世纪之交,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建筑师们对各种新技术在建筑领域应用的热情有增无减。有关建筑与技术的讨论集中反映在:科技发展对建筑学的影响;信息科学与建筑发展;建筑技术中自然与人类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建筑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及其它;传统技术、高技术与适宜技术并存与促进;建筑技术的地域性;现代城市的技术发展;建筑技术与经济;建筑的技术与艺术创造;未来技术与社会等方面。今天,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但是,究竟接受什么?如何接受?如何继续前进?有学者呼吁:应当努力抵制高新科技和先锋产品所展示出的“建筑迷信”,要学会用简单的材料发挥创造性。建筑的根本目标是创造愉快的生活空间,因此,要允许多种文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他们自己的地位。

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工业化国家的建筑师从尊重自然与传统出发,表现出对地方性适宜性技术的浓厚兴趣;而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却更多地追随在某些发达国家的未来学家后面,大力畅想21世纪知识时代人类的“高科技”生活,并创造出许多新的词汇来形容这似乎就要到来的情景。有人提出:今后可以依靠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等使城镇布局分散化,更易亲近大自然(如美国硅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高清晰电子屏幕、虚拟现实装置等,都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广泛运用于“建筑”之中。同时,他们认为:21世纪的建筑师将面临知识、技能与理念的更新;由于在建筑创作与实施过程中提高了科技的含量,建筑师应具备全新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段。

笔者认为,人们对高技术的未来充满憧憬和幻想,但同时也应承认建筑是古老的,甚至是永恒的。如何将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这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

4. 建筑与文化

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多极化趋势的继续发展,多种地区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并存。建筑遗产与传统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以及不同地区的建筑文化特色,受到各国建筑师的更多关注。

来自哥斯达黎加的布鲁诺·斯达格诺教授,提出环境融合(environmental syncretism)的概念。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运动产生的国际式建筑席卷了他的国家,第一次造成了城市形式的混乱无序;所有外来的都被认为是现代的,但却从来没有检验一下现代性的基本信条;这种现代的

审美取向并没有根植到地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去。因此,新的思路是从尊重环境出发,恢复传统文化的表现,而文化必须立足于过去,扎根于自身的民族土壤。今天的建筑正期待着一种切实而稳定的力量,给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赋予鲜明的个性。

5. 建筑教育与青年建筑师

现在世界上高等教育的普遍趋势是专门化与狭窄领域知识的深化,而这种趋势是与建筑本质上的综合性相矛盾的。因此,“广义建筑学”和“社区建筑师”(以及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等)将成为21世纪建筑教育和青年建筑师培养的重要内容,而新型建筑学院的普及,将必然要抵制由某种建筑教育主管部门控制的现行学位认定的标准。过去的建筑教育,曾引导学生们在建筑物的体形设计方面倾注最大的精力,时至今日,新世纪的教育方针是否应更加关心历史进程与生态环境?愿青年建筑师们能亲身投入到一个更加广大的建筑空间中去,体察社会的脉搏,倾听普通公众对21世纪建筑学的期望。

三、关于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运动的几点思考

目前的建筑与规划理论和技术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均是有利有弊,最终形成规划设计的过程并不是完全明确和客观的科学决策过程,而是主观与经验的成分依不同情况还占有相当的比例。在实际生活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为什么发展的焦点总是对准那些传统的城镇密集地区,而近几十年来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所建设起来的田园城镇,却始终与经济繁荣的热望失之交臂。

由于公众对建筑与规划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将许多政治经济的责任和社会理想的实现与物质形态建设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家们因此开始频繁地干预建筑与规划的技术过程,并对规划设计的目标、解决的途径和运作的时限等提出不适当的要求。政府机构的功能程序有时也喜欢将所有的问题都统一到一个答案之中。另一方面,建筑师、规划师也经常对政治家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希望政治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效的干预,藉此达到他们所主观预想的发展目标。

面对这错综复杂的局面,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建筑师、规划师提出,他们今后的任务之一,应是不断调整自己在城镇中开展工作的方式,并学习经过改进的社区参与方法,在原有的“自上而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自下而上”的能力。除了在越来越少的大规模开发建设规划中可以重温传统的“理想图景”外,建筑师、规划师的注意力应越来越多地放在城镇社区发展中的“扶助自强”(enabling)和“改善”(improvement)的概念上。这其中的要点包括:(1)不

断明确地方政府以及规划部门进行发展控制和干预的目的、合理性和具体方式;(2)鼓励所有的人提高规划意识,运用当地居民关于环境条件的广泛知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地方资源,并相机提供多种规划服务;(3)重视当地居民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提高规划过程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争取共同努力、殊途同归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有不少错误,吴良镛教授明确地指出:“我们尚在重复西方城市化过程中的错误”。为了继续向前发展,学习西方的经验,总结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中的教训,仍是十分必要的。

西方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经验正陆续传到国内,不胜枚举。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城市美好形象的建设,既要考虑到景观环境的统一性,更要关注城市建设的公共政策和技术管理。具体来说,要特别重视以下3个方面。

1. 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目标是指导城市有序成长

以北京市为例,曾提出过:“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将北京建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补救和纠正城市物质形态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的城市亟待发展,旧城旧区有必要改造,但究竟从何处着手?以西方的实践经验为例,伦敦东部重建的码头区原是最残破的仓库和旧式工业用地,柏林改建的中心区是过去空旷的“柏林墙”地带,而为什么我们现在却急于将大拆大建的矛头指向传统的旧城居住区,甚至是历史文化保护地段?有关学者曾多次向北京市发出呼吁:应当放慢“旧城改造”的速度;对旧城宜采取“有机更新”、“小规模改建”的方式,而不是急功近利、大拆大改;在旧城内要保留适当的居住职能,并改善其环境,等等,遗憾的是难以见到改进的行动。

这里核心的政策问题是:究竟是规划控制开发,还是开发控制规划。这一问题解决不好,城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有序成长,是难以圆满实现的。

2. 规划建设的原则是符合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

当前城市开发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建设当局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在旧城改造中放手让开发商在市中心自由横行。开发商赚大头,城市赚小头,吃亏的是普通市民,损害了城市的长远利益。为了在市区盖几个“豪华”、“神气”的大旅馆、大写字楼和大商场,不惜占用有限的城市绿地,甚至中小学校的操场,并将在中心区居住多年的普通居民百姓挤赶

(下转第59页)

很难想得太远,并为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都作出计划。其次,即使能够作出单个计划,各缔约方也很难就这些计划达成协议,因为他们很难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来描述各种情况和各种行为;对于这些,过去的经验也提供不了多大帮助。第三,即使各方可以对将来进行计划和协商,他们也很难将下述内容在计划中写出来,即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外部权威,比如法院,能够明确这些计划是什么意思并加以强制执行。换句话说,虽然双方能够相互交流,而且能够与对各缔约方运作环境可能一无所知的局外人进行交流,但由于技术的高度专业化背景,做到这一点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显然,高昂的成本必然会限制人们达成完全合约的努力。

综上所述,技术合约不完全性的内在根源在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技术的公共物品属性、技术产权界定的复杂性、人的有限理性以及高昂的签约成本。技术合约的不完全性和达成合约的高昂成本,极大地限制了市场这种规制方式对技术成果转化的作用,价格的调节不能使技术市场出清。所以,我们必须根据技术交易的内在规律和

(上接第 37 页)

到市区的边缘。城市从此背上沉重的基础设施的包袱。西方房地产商 100 年前的故技,今天在我国的多城市重演。

据统计,北京市 4 个城区的土地面积仅有 87.1 平方公里,1997 年底的常住人口 244.6 万人,即人均用地 36 平方米。与 1993 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城市建设的重点要从市区向远郊区转移……尽快形成市区与远郊城镇间的快速交通系统,加快远郊城镇的建设”时相比,城区常住人口并未减少,而城市流动人口又有大幅度增加,许多高楼大厦仍继续在北京城区内兴建。从局部而言,这里不乏精心的城市建筑设计之作,但从整体上看,在开发者无止境追逐利润和政策上片面理解“节约用地”的情况下,建筑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失去控制,城市更加拥挤不堪,环境条件更加恶化。

这里核心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按照符合城市长远利益的合理的环境容量进行城市规划设计。

3. 具体的建设方法是从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点滴做起

在北京的发展中,万众瞩目的问题是“行路难”,矛头直指城市道路建设和交通管理。我国许多城市道路目前的状况是:大量人流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车流;大面积无序的自行车停放;各类摊贩的沿街叫买;行人和车辆饱受交通堵塞之苦。

解决北京市区的道路和交通问题,牵涉的方面很多,要想从根本上进行治理,也许尚有待更长的时日。但笔者的期望是:“莫因善小而不为”。这里也许不能

特点,选择交易成本最低的合约安排和规制方式,以弥补个人在不确定和复杂环境中理性的不足,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参考文献

- [1] 奥利弗·威廉姆森. 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 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4
- [2] 道格拉斯·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37
- [3] 巴泽尔. 产权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
- [4] 罗伯特·考特等. 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17
- [5] Yang, X. (198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dependence, economic growth and market structure", Ph. D. Dissertation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 [6] O. Hart (1995): 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7] H. A. Simon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MIT Press, 1982
- [8] O. E. Williamson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PP21 - 23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责任编辑 王宏章)

体现最“高级”的建筑或城市设计,但却能进行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工作。试想,如果能架设一些不大的过街天桥,适当开辟公共交通工具的港湾式停靠位置,合理安排自行车存放场地,沿街建筑物能按照规划后退红线,再加上必要的交通管制与管理,拥堵的状况是肯定可以得到改善的。如果以这种态度来进行北京市区内的每一处交通拥阻路段的城市规划设计,全市的“行路难”矛盾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缓解。

这里的城市规划设计政策应是:尊重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从群众利益出发,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主要参考文献

- [1] United Nations, Habitat Agenda and Istanbul Declaration, Secon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Istanbul, Turkey, 3 - 14 June 1996
- [2] 《XX UIA CONGRESS ACADEMIC TREATISES》, Vol. 1 - 4, Beijing, 1999
- [3] 吴良镛. 世纪之交的凝思:建筑学的未来.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
- [4] 吴良镛. 吴良镛城市研究论文集——迎接新世纪的来临 (1986 ~ 199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6
- [5] 毛其智. 从西方的经验,试论城市设计的概念与方法. 北京规划建设, 1998(1), P30 - 33
- [6] 毛其智. 倾听 21 世纪的声音——国际建协第 20 届大会学术论文浏览. 世界建筑, 1999(6), P18 - 20
- [7] 毛其智. 加强人居环境研究,积极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 市长参考, 1999(5), P41 - 43
- [8] 北京市统计局编. 北京统计年鉴 1998.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肖庆山)